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1.008

## 湖南作家作品研究·《山南水北》专辑 主持人：湖南师范大学杨经建教授

主持人语：韩少功的《山南水北》于2006年10月出版，一经问世即好评如潮，先后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和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从历经都市之惑到看取山水之意，在这本乡居笔记中，韩少功对“山南水北”的呈现，不仅仅是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感知，更渗透着对人文乡土的理性考量。正是感性之知与理性之思的自恰，使《山南水北》出乎本心、超乎凡俗。《山南水北》可以看作是韩少功的一种与生命同行的文学际遇、一种具有反思意味的创作轮回、一种参透人生的心灵感悟、一种爱得我所的精神栖居。

毋庸赘言，对《山南水北》的研究已有不少真知卓识，但任何优秀文学作品的价值都拥有不断增生且经得起不断诠释的品格，本专栏的三篇文章就是为了印证这一点。王蕾《〈山南水北〉：知识分子的还乡书写》认为，作为知识分子“还乡”书写的典范之作，《山南水北》表明了韩少功在离乡—还乡的人生行走中，一直以“出世之虚心做入世之实事”，探索着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他不仅在对自然的皈依中体验“天人合一”之道，于山南水北间追寻人性的本真，而且以朴素的赤子之心、平和的处事之态，来重构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探索和思考人类文明的过去、现代与未来。周爱华《乡村日常的诗意建构》认为，韩少功在乡土叙事中，一方面阐发了自己对乡村生活及村民生存状态的审美体验和形而上思索，另一方面，也缓解了他在现代都市和传统乡村夹缝中生存的焦虑。韩少功所追求的，一是回归乡村自然和土地劳作，以此安放身心；二是从事文学创作，使日常生活审美化。杨经建、周圆圆《独树一帜的生态文学创作》一文，触及到的虽然仍是生态文学问题，但与以往类似话题的研究不同，文章追溯韩少功生态观的根源，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等三个层面发掘了《山南水北》中所蕴含的生态美学蕴涵和生命文明意识。

韩少功在一次访谈中说：“只要人还在，只要人还需要表达思想情感，文学肯定比我们活得更长久。”的确，只要《山南水北》式的作品不断出现，文学肯定比我们活得更长久。

# 独树一帜的生态文学创作 ——评韩少功《山南水北》

杨经建，周圆圆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韩少功散文集《山南水北》是一部以审美化手法表现作者生态观的作品。作品通过描述天人兼容与古今变异的自然—社会生态、乡土世界温情与困境并存的精神生态，对现代物质文明影响下乡村变异现象进行反思，蕴含着深刻的生态美学内涵和生命文明意识，其对中国生态文学的创作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收稿日期：2018-09-15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基地项目及奖励项目“突破与新变：新时期湖南文学的新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研究”（17JD56）

作者简介：杨经建（1955—），男，湖南浏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与戏剧影视文学；周圆圆（1995—），女，湖南衡阳人，湖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关键词: 韩少功; 《山南水北》; 生态文学; 自然生态; 精神生态

中图分类号: I207.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1-0051-06

引用格式: 杨经建, 周圆圆. 独树一帜的生态文学创作: 评韩少功《山南水北》[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1): 51-56.

## Unique Ecological Literature Creation: Comment on Han Shaogong's *South of the Mountain and North of the Water*

YANG Jingjian, ZHOU Yuanyu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Han Shaogong's prose collection, *South of the Mountain and North of the Water*, is a work that expresses the ecological view of the author by means of aestheticization. By describing the natural-social ecology of nature-human compatibility and ancient-modern variation, and the spiritual ecology of the coexistence of warmth and predicament in the vernacular world, the work reflects on the phenomenon of rural vari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material civilization, which contains profound ecological aesthetic connotation and life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and has a strong inspiration to the Chinese ecological literature creation.

**Keywords:** Han Shaogong; *South of the Mountain and North of the Water*; ecological literature; natural ecology; spiritual ecology

1999年,韩少功等人在海南南山主持召开“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国内外作家、学者对文学与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会议文献汇集成《南山纪要》,现已成为对国内生态文学乃至生态美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文献。2000年初,韩少功自海南省海口市迁入湖南省汨罗市八溪峒乡,潜居默写,于2006年为读者奉献了非同凡响的随笔集《山南水北》。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韩少功在创作时将身心融入自然,在“山南水北”中乐此不疲地寻找生命的意义,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并用诗化的散文形式予以呈现。其丰赡而独特的文学内涵带给文坛清新怡人的“绿色文学”之风,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和讨论。

### 一 对生态文明的审美化表述

创作《山南水北》时,韩少功已过不惑、近知天命。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在城乡间的多次穿梭流连中展开的。从年少时投奔农村亲戚失败后的无奈返城,到“文革”中下乡做知青,再到厌倦乡村、“羞于抱怨农村的艰苦和青春的苦闷”回

城做一名知识分子,年轻的韩少功对乡村有过向往,也有过逃离,但对乡村美好清洁的自然生态一直印象深刻。“即便是当知青的时候,除了贫困让人深深焦虑,大自然的广阔和清洁从不让我烦恼,并且在后来很多文学作品中一直是我心中的兴奋。”<sup>[1]18</sup>回城任职与写作期间,韩少功见证了现代工业文明施加于城市的魔咒。日益疏远的人际关系,牵扯不清的利益纠葛,无数“成功人士圈子以外”的沉重,使得韩少功“讨厌太多所谓上等人的没心没肺或多愁善感,受不了频繁交往中越来越常见的无话可说”<sup>[1]10</sup>。在此情形下,乡村回忆指引他梦回临近湖水和山崖的小土房,使他再次产生逃离城市、回归故土的冲动。定居乡村后,韩少功对社会的思考在乡野生活中发酵,对精神的感知在晴耕雨读中深化。

热爱生态、关注生态,是韩少功创作思想的重要源泉。韩少功知青时期便开始关注生态环境,回城后,他在创作作品、主编《天涯》杂志之余,召集国内外学者,举行了“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汇编了文献集《南山纪要》。《南山纪要》

对当时人们热议的“发展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在那之后不久, 韩少功便离开海口去了八溪峒。可以说, 《山南水北》是韩少功对《南山纪要》中生态思想的审美化表述, 也是我国新世纪以来生态文学的创作实绩。“生态文学”是建立于生态学基础之上的文学形态。根据王诺在其《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中的概括, 生态文学具有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等四大特点, 是一种“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sup>[2]16</sup>。这种生态文学的定义, 重在“生态”二字, 但对生态文学何以成为“文学”的诠释有所欠缺。这也造成了生态文学发展初期以纪实性报告文学、通讯等非虚构文学形式为主, 不够多元且较缺乏文学意味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 吴秀明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文学》一文中对生态文学进行了新的界说。他认为生态文学在靠近生态学的同时, 需要经过艺术的特殊化来保持文学的特点; 他主张通过情感来统摄主体与客体、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通过人物的艺术形象将人类对生态的思考转换成形象生动、充满艺术感性魅力的文学话语。“生态文学说到底是用审美的方式与生态进行对话, 并将它转换为文学与生态学结合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对于生态文学来说, 它的主要价值不在写了什么样的生态而是怎样写生态, 即怎样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态的切身体验和感受、通过写情和写人的审美中介将生态转换成审美话语。”<sup>[3]</sup>

就《山南水北》的创作而言, 城乡之间的迁徙令韩少功深谙城乡不同的生态特点, 也让他能够凭借知识分子和农人的双重身份对城市与乡村生活进行细致的感受和体验。王尧曾评价道, 带有原生态的细节构成了《山南水北》的肌理, 构成了韩少功作为一个思想者的质感, 而捕捉“原生态的细节”的能力已经是无数作家丧失了的能力。<sup>[4]</sup>这种能力包含了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思索, 摒弃了压制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 在不疾不徐的叙述中流露出作家对自然与人的思考以及生态“文学”应有的诗意气质。“当代中国生态文学饱受诟病的局限, 表现于生态叙事过于模式化、

概念化, 艺术魅力稀薄匮乏, 人性探索不够深入。绝大多数当代中国生态文学作品中, 作家几乎都是千篇一律地叙述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大肆控诉现代人的欲望泛滥, 对大自然的溃败哀婉绝望。”<sup>[5]</sup>和多数生态报告文学作品相比, 《山南水北》多了几分雅致和诗意; 与多数生态小说相比, 《山南水北》多了几分情致和韵味。韩少功从回归乡土的视角描写山野的自然百态, 在娓娓道来中表现出当代知识分子对生态文明与人类关系的洞察能力。

## 二 自然生态: 天人兼容与古今变异

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历时久远、内涵丰富。《易经》云: “天地养万物。”<sup>[6]89</sup>《中庸》言: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sup>[7]422</sup>叶燮《原诗》则道: 文章表天地万物之情状。<sup>[8]48</sup>在漫长的文学史上, 大自然一直为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创作资源,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山水诗就是最好的例子。《山南水北》对中国古代生态思想有很好的继承,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是对儒道先哲“天人合一”的精神与平等和谐的生态观的接纳。庄子言: “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sup>[9]31</sup>; 孟子曰: “君子之于物也, 爱之而弗仁; 于民也, 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sup>[10]315</sup>在当代, 先哲思想中的“仁爱”从人与人之间扩大到了人与世间万物之间的自然而然的和谐。农妇教导作者栽种果树之道时说: “要对树们多讲讲话, 尤其不能分亲疏厚薄, 要一碗水端平。”(《山南水北·再说草木》) 受老住户欺负的小母鸡“小红点”被人救下便开始“亲人不亲鸡”, 一有机会就跑到韩家大门探头探脑。(《山南水北·小红点的故事》) 这种万物平等的和谐氛围既是自然生态为人与万物生存提供的条件, 也是八溪峒原生的自然生态基础。其二则是对返朴归真的道家思想的传承。《老子》曰: “见素抱朴, 少私寡欲。”“上善若水, 水利万物而不争。”<sup>[11]15</sup>面对纷繁的社会, 老子主张淡泊清静, 与世无争, 活出真实自我。比起城市的冷漠和麻木, 韩少功选择乡村作为灵魂的栖处与创作的沃土, 体现了他的返朴归真思想。他不愿被高楼挤压、被噪声烧灼、被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 于是向都市提问: “画框里的山山水水

水真是那样遥不可及吗?”然后以实践作答:“我不相信,于是扑通一声扑进画框里来了。”<sup>[14]</sup>只有回到乡村,远离钢铁水泥的囚笼,韩少功才能忘记城市的噪声和欲望,活出自己想要的真实和活力。在淳朴的土地上,他恢复了一度遗失的强壮和灵巧,恢复了手心的茧皮、面上的盐粉,也恢复了阳光下“目光迷离的能力”。他主动亲近自然、感恩自然、倾听自然。他感受着城市里难以感受到的气息,以心灵体验生机,通过人与自然的协调相济进入了一种“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境界。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sup>[12]56</sup>在生活方式日益便利的今天,八溪峒人被社会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浸染,在生活中也渐渐与自然产生隔阂,其最明显的便是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变化。城镇的繁华吸引大量村民外出打拼,大家年节时纷纷携礼返乡,为乡村带来了现代化的种种成果,不过人们的很多行为其实是对都市作派的粗劣模仿。当韩少功穿着便于打理的胶鞋开荒、务农时,他在邻人眼中看到了惊讶之色——“他们脚下已见不到这种鞋子。哪怕是一位老农,出门也经常踏一双皮鞋——尽管皮鞋可能蒙有灰尘甚至猪粪,破旧得像一只只咸鱼。”<sup>[11]25</sup>年轻女子把高跟鞋、厚底松糕鞋当宠儿;西装成衣成了男人的“准制服”,为劳作之便不得不上束腰围兜或遮阳斗笠,使之变成不伦不类的兼容模式;仿照城镇楼宅建起的水泥板楼房舍弃了堆放农具谷物的地方,致使不习惯的农家老人不得不另搭偏棚居住;电话代人呼朋唤友,人们遗忘了遇年节喜事要上门相请长辈的礼节。后生们大多自愿让现代化娱乐手段填满自己的闲暇时光,不再亲近祖辈赖以生存的山水,日渐丧失了祖辈在山林里培养的好眼力。与此同时,生态环境遭到蹂躏,人的贪欲助长了“破坏”的生产力,使人们忘记了自然中“人”的历史和真谛。

马克思分析生态问题本质时曾说:生态问题是社会问题。<sup>[2]71</sup>分析人与自然生态,也有必要联系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况展开思考。“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

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自己的属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才成为人的属人存在,而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成为人。”<sup>[13]</sup>在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受现代文明的影响产生矛盾时,人类的社会生活也受到了极大影响。在《山南水北》中,韩少功用近三分之二的篇章,通过对社会生态的描写,展现了乡村世态人情,构造出生动逼真的乡村世界。

八溪峒人的生存状态大体上说是淳朴而真切的。这里有相貌奇丑但深得村民爱戴的厚道地主吴县长,有技艺惊人、对村民情深义重的剃头匠何爹,还有在韩少功一家开荒时热心地送来草灰肥料的人、无私传授种植与收获窍门的人、青黄不接时慷慨互助的人……他们使作者得以感受到乡间的温暖。随着享乐主义与利益至上思想的盛行,越来越多的贪欲在乡民的心中滋生。他们试图对自然资源进行“巧取”或“豪夺”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被破坏,道德变异现象不断出现。最典型的现象便是先祖推崇及孝道的衰微。对乡人而言,祖先的分量极重,毕竟自己身边不远处可能就有先祖的长眠之地,而先祖的“注视”给乡人们带来了无形的监管和道德上的束缚,因此,村民们自古便看重对在世老人的侍奉。但在当下侍奉逐渐衰落成戏剧化的“孝道展示”。人们一边怠慢老人,一边惧怕天地祖先给自己带来惩罚,于是就有了雷声响起时大声问老父母、爷爷奶奶需不需要捶背吃肉,以及大张旗鼓地在室外为老人切肉等荒谬行为。大家试图以临时的孝行让先祖明白自己是“好人”,掩盖孝道衰微的事实。

道德伦理没落,妄佞之心渐生。道德异化的同时,各种堕落、腐化现象层出不穷。村民雨秋放弃人们特意为他凑钱物色的好农舍,由着崭新的扶贫衣物在危房里放到发臭,目的是为了维持贫穷的表象,以骗取用于玩乐的扶贫资金。包工头老潘耽误工期成天打牌,一输再输,却成了最受欢迎的“扶贫干部”。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本该做“青天”的当地领导为利折腰,甚至罔顾法律民生。“从社会观点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以维持社会的生存和绵续。”<sup>[14]36</sup>现代化经济下的物质诱惑,促使人们放弃道德原则追逐利益;道德

约束的弱化又带来其自我价值与精神的丧失, 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物质化生活、对利益与享乐的追逐和沉迷。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认为人具有自然性, 要求人们认识、尊重自然规律, 尊重万物, 这与韩少功寻找灵魂的栖息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人与自然生态的关注是《山南水北》成书的根基, 也是韩少功从骨子里重视的东西。对享乐与物资生活的一味追求导致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过度依赖, 造成人们精神的失落。韩少功在《山南水北·雷击》一文中带着感慨提出“一旦人们能用物质手段来保护自己, 精神也许会变得累赘多余?”的疑问, 也在启示人们关注精神世界, 回归自然而和谐的文明生态。

### 三 精神生态: 温情与困境并存

雅斯贝尔斯说: “人就是精神, 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一种精神的处境。”<sup>[153]</sup> 鲁枢元也提出了“精神生态”的概念。他们的观点为解析《山南水北》体现的精神生态提供了指导。

精神自由是人类追求的至高境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漫长历程中, 许许多多仁人志士在面临得不到自由的生存环境下, 发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号。而在韩少功的笔下, 山乡中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村民们却能轻易地获得这份自由。

“乡间空气清新自不待言, 环境优美也自不待言, 劳动的对象和内容往往多变, 今天种地, 明天打鱼, 后天赶马或者采茶, 决不会限于单一的工序。即使是种地、播种、除草、杀虫、打枝、授粉、灌溉、收割等等, 干起来决不拘于一种姿势, 一种动作, 一个关注点。”<sup>[1159]</sup> 灵活多变的劳动过程带着愉悦, 带着欢声笑语和动听的山歌, 使人们从身体到心灵都得到自由。对于劳动生活, 韩少功充满了赞美和欣赏。“我们要亲手创造出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 在生命之链最原初的地方接管生活, 收回自己这一辈子该出力时就出力的权利。这决不意味着我蔑视智能, 恰恰相反——这正是我充分运用智能后的开心一刻。”<sup>[1135]</sup> 在他心里, 乡村人过的就是一种天然去雕饰的朴实生活。较之科技化的城市, 韩少功说: “一个科学幻想作品曾经预言: 将来的人类都形如章鱼, 一个过分发达的大脑以外, 无用的肢体将退化成一些细弱的游须,

只要能按键盘就行。……章鱼的形象让我鄙薄。一台形似章鱼的多管吸血机器更让我厌恶。这种念头使我立即买来了锄头和耙头, 买来了草帽和胶鞋, 选定了一块寂静荒坡, 向想象中的满地庄稼走过去。”<sup>[113]</sup> 自由、洁净、清新又富有生机和创造力, 生活在乡村让人得以恢复人最初的本真面貌。乡村人丰富的创造精神和劳动精神为人拒绝了退化, 为人类天性保持了尊严和风度。

看似粗野实则可亲、看似落后愚昧实则真诚可爱的乡村精神使人打心里感受到人性的温暖。

“下乡的一大收获, 是看到很多特别的笑脸, 天然而多样。每一朵笑几乎都是爆出来的, 爆在小店里, 村路上, 渡船上, 以及马帮里。”<sup>[1123]</sup> 这些笑容难以用语言描述, 有着“野生的恣意妄为”与“原生的桀骜不驯”。比起都市笑容的优雅、内敛、礼貌、疏离甚至冷漠, 山乡的笑自然亲切、充满生机, 体现了八溪峒人精神上的快乐和满足, 塑造了山民性格中乐观与朴实的一面。每年春天青黄不接, 作者一家外出寻野菜, 路遇农妇时常被她们笑眯眯地招呼, 然后被询问家中有没有菜吃——意思是要不要上她们的园子摘点什么。乡村的善良温和而平静, 仁爱之心如同春雨冬阳般滋润忙碌的村民, 激发出人性精神中向善向美的一面。

与此同时, 在正视“世道”对于“人心”影响的前提下, 一种清醒而冷静的现实主义精神, 使得韩少功也不避讳乡民们精神世界或乡土中国精神生态的另一面相。韩少功写道, 八溪峒人虽然也会跟着时代潮流看电视、用电脑, 但在思想、精神层面上传统的愚昧迷信和现代知识的缺失, 使村民的生活还是落后于时代, 他们往往凭着日常经验和本真感觉过日子。非典时期, 村民们无视科学宣传, 只肯信传说中“突然说话的哑婆婆”去烧香燃放求平安, 乡长禁止也无效, 只能说“要是命里有不放鞭炮也不会死, 要是命里没有放再多鞭炮也是白搭”才劝服众人(《山南水北·非典时期》)。自称教师的年轻小伙子四处拉人信中国化了的西方宗教, 炫耀入教后可以做到重病不治而愈、哑巴开口、瘸子跑步, 可竟然连自己教中的祖师级人物都未曾听闻(《山南水北·一师教》)。质言之, 传统愚昧的顽固和现代知识的缺乏一起织就了一张巨大的渔网, 网住了不明

事理的人们,并和物质文明一起幻化出了一个等待猎物上门的巨大陷阱。韩少功发现了这一点,他担忧现代文明的畸形发展会给乡村带来沉重的精神病状,因为他看见了利益逼迫下失去生存根基的土地而不断外流的农民,看到了高楼的影子里繁殖出的“垃圾村”和“卖血村”,看见了许多离开土地后连心灵也流离失所的人们。他不禁问道:“哪一天工业也变成了农业,哪一天农民也都西装革履地进了沉闷写字楼,我还能去哪里听到呼啸和山歌,还有月色里的撒野狂欢?”<sup>[1]160</sup>这看似是质问城市化之后的乡村图景,实则道出了韩少功对现代人精神归处的担忧。

针对这种精神困境,韩少功主张秉持本性,找到人在自然、社会中该有的位置,尽量地靠近、回归人们本该最亲近的自然生态。他近年受访时曾谈到现代农村生活,“以前很多人营养不良,现在倒是营养过剩,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肥胖症等‘富贵病’成了很多人的烦心事……其实工业的生产流水线才太单调,不合人性。相比之下,农村生活要自由和丰富得多。有些高人,高就高在能够在劳动和创业中享受‘诗’意,创造‘诗’境,活得诗意盎然,把人间过出天堂的味道。这种人不会太多,其情怀和才能非同寻常,他们最明白‘远方’就是脚下。”<sup>[16]</sup>现代化的城市便利没有带来温暖,这直接导致了韩少功的“逃离”,但他要逃离的并非现代化的生活,而是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过度依赖现代化的生存现状。毋庸置疑,人类幸福需要良好的物质条件做基础,但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富足。远离喧嚣和功利,借助与乡土自然的近距离接触,找回人类本真善良的天性,这才是韩少功回归“山南水北”的真正所得。“不断的物质进步与不断的精神回退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可靠的进步必须也同时是回退的。这种回退,需要我们经常减除物质欲望,减除对知识、技术的依赖和迷信,需要我们一次次回归到原始的赤子状态,直接面对一座高山或一片树林来理解生命的意义。”<sup>[17]221</sup>立足当下,拒绝以人类私欲为目标的生活;寻找被遗忘的精神秉性,滋养已经贫瘠的心灵;在乐山乐水中心度过并不漫长的人生、思索人的价值。这便

是作者归乡、亲近自然的真谛。

总而言之,韩少功对“山南水北”的诗性描写和艺术思考,其中寄寓的是他对社会现代化的理性反思。诚如《南山纪要》所言,“中国因特殊国情注定要在现代改革和建设过程中承受环境—生态的超常压力,中国的知识界和批评界也因此有可能从这一视角开始思想和文化的创新。这可能正是一种幸运。”<sup>[18]</sup>

#### 参考文献:

- [1] 韩少功.山南水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 [2] 王 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3] 吴秀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文学[J].理论与创作,2006(1):6.
- [4] 王 尧.韩少功和《山南水北》[N].文汇报,2006-11-18(07).
- [5] 汪树东.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四个局限及可能出路[J].长江文艺评论,2016(4):25.
- [6] 易 经[M].梁海明,译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89.
- [7] 陈戍国.礼记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422.
- [8] 吕智敏.诗源·诗美·诗法探幽:《原诗》评释[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48.
- [9] 庄 周.庄子[M].方 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31.
- [10] 孟 轲.孟子[M].万丽华,蓝 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315.
- [11] 马将伟.道德经译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5.
- [12] 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6.
- [13] 柳兰芳.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社会生态的辩证统一[J].社会科学家,2013(7):17-18.
- [14]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6.
- [15] 卡尔·雅斯贝尔斯.当代的精神处境[M].黄 藿,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3.
- [16] 鄂 璠,杨 柳.在文学这场马拉松里,我不曾“跟风赶潮”:专访作家韩少功[J].小康,2017(16):35.
- [17] 韩少功.进步的回退[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221.
- [18] 张 炜,李 锐,苏 童,等.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J].天涯,2001(1):24.

责任编辑:黄声波